

政治文化、政党文化与党内政治文化关系辨析^{*}

柴宝勇 黎田

【内容提要】政治文化、政党文化与党内政治文化三者具有特定的概念所指。从概念差异性的角度看，政治文化、政党文化与党内政治文化在生成逻辑、核心要素、评价尺度和传递路径上具有显著区别；从概念统一性的角度看，政治文化、政党文化与党内政治文化在文化性质、文化效能、文化层积和文化变迁上具有鲜明共性。新时代，要立足中国政治发展实际，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认识政治文化、政党文化与党内政治文化的内在联系，进一步理解三者的具体内涵和主要特征。

【关键词】政治文化 政党文化 党内政治文化

作者简介：柴宝勇（1979-），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副主编（北京 102488）；黎田（1997-），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文化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聚合形态，是不同国家、民族或地区人民群众内在精神和外在实践生发、演绎和变迁的客观结果。在不同社会领域，文化呈现出纷繁复杂的表现形式和具体特征。在政治领域，文化又生发出政治文化、政党文化和党内政治文化等概念。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开始进行政治文化和政党文化的研究。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以来，关于党内政治文化的研究也逐渐增多。政治文化、政党文化、党内政治文化在生成与演进的逻辑、内涵与外延的界定、结构与功能的表征等诸多领域既具有差异性，也存在统一性。本文主要立足中国实际，对三者的概念及关系进行系统考辨。

一、政治文化、政党文化与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

探讨政治文化、政党文化与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须从其发端的特定背景和演进的具体历程出发，分析其所涉及的政治主体、政治客体和政治环境。

1. 政治文化的形成与阐释

列宁于1920年明确提出了政治文化的概念，强调：“政治文化、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真正的共产主义者。”^②在这里，列宁将政治文化与政治教育并列，将其视为无产阶级政权培养共产主义者政治意识，强化共产主义者理想信念的重要路径。我国改革开放后的“文化热”推动了国内学界对政治文化的广泛研究，许多学者对政治文化的内涵进行了阐释。代表性的观点有：意识论，“政治

^{*} 本文系2019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卓越学者项目“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理论逻辑与现实要求研究”（20190010）和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理论与实践研究”（19BZZ020）的阶段性成果。

^② 《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46页。

文化是政治活动中的一种主观意识领域”^①；积淀论，“政治文化，主要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实践中所形成的各种政治思想、理论、价值观念等的总积淀”^②。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③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看，政治文化的形成是政治实践发展和政治制度建构的必然结果。政治主体在政治制度的框架下，通过各种形式的政治实践参与政治体系的运行，行使政治权力和履行政治义务，以期实现或维护自身的政治利益。这些政治实践将抽象的政治价值取向转化为政治主体的自觉行为，从而使政治文化具有实际含义。因此，政治文化可以理解为显性政治实践、政治制度背后所蕴含的隐性观念形态。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同时，继承和发扬了和合文化、家国文化、廉政文化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借鉴国外优秀政治文明成果，实现了对中国政治文化的重塑，并推动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它是党所领导的伟大事业的精神产物，是维护国家政治清明和长治久安的价值纽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一是具有内在的革命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突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指导地位，为党领导社会革命和进行自我革命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二是具有广泛的包容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体现了政治关系的和谐稳定与政治主体的团结协作，有利于充分凝聚全社会的政治共识。三是具有鲜明的人民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彰显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体现了公权力主体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理念，凝结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价值追求。

2. 政党文化的兴起与界定

进入21世纪以来，有关政党文化的研究开始逐渐走向深入，一些学者对政党文化的概念进行了阐释。有学者从组织文化的角度认为政党文化是：“政党所具有的为全体成员所认同的意识形态（或说政治思想）、组织心理、制度规范、行为作风以及由此决定的政党形象。”^④有学者从语源分析的角度认为政党文化是：“政党意识的外化形态。”^⑤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定义均是从政党个体微观的视角对政党文化的概念进行界定，缺少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整体政党文化的关照。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存在两个及以上的政党。这些政党在本国或本地区的政治体系中处于或合作、或竞争的互动状态，这些交往所形成的政党格局同样具有明确的价值导向和行为理念。因此，政党文化既应包括政党个体呈现的文化，也应包括一个国家或地区政党集合呈现的文化。在中国，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不是相互博弈、相互掣肘的竞争关系，而是通过各种形式的协商实践和监督实践来充分发挥各方优势。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和各民主党派的政党文化不同；中国的政党文化和其他国家的政党文化也不同。因此笔者认为，政党文化应具有两层含义：（1）从个体政党维度来看，政党文化即党内文化，指政党组织所具有的主观意识集合；（2）从宏观政党格局来看，政党文化即党际文化，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政党交往模式所蕴含的整体观念形态。

应当注意的是，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政党文化与政党意识形态是两组既相互联系，又截然不同的概念。意识形态是“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观念的总和”^⑥，涉及政治、经济、

① 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9页。

② 徐大同、高建：《试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与特征》，《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5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4页。

④ 赵理富：《政党文化探析》，《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

⑤ 桑玉成、李冉：《政党文化与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

⑥ 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97页。

社会、生态、文艺、教育、军事等多个领域，是体系健全、逻辑严密的思想体系。政党意识形态是政党对自身根本利益维护和追求的认知体系，是政党对自身地位、权力获取、政治参与、社会活动、组织建设等重大议题的系统认知。政党的纲领可以视为政党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不可否认，意识形态或政党意识形态对政治文化或政党文化的塑造具有深刻影响。但从概念阐释的角度来看，意识形态、政党意识形态比政治文化、政党文化的内涵更加宽泛化、系统化和理论化。毛泽东把意识形态视为改造现实社会的理论路径，并提出了“社会意识形态是理论上再造出现实社会”^①的论断。虽然在意识形态或政党意识形态中也具有相关的价值、观念和信仰等抽象性内容，但其更加表明一种维护统治阶级或政党自身根本利益的理想状态。而政治文化、政党文化是对特定领域政治成员集体精神状态和内在心理活动的实时呈现。

3. 党内政治文化的提出与解读

党内政治文化一般指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文化。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党内政治文化”的概念，这是新时代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一方面，从坚持文化自信的角度来看，党内政治文化是凝聚全党的精神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文化自信对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影响，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②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领导核心，其党内政治文化构成新时代坚持文化自信的重要渊源和关键内容，是党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和伟大梦想的丰厚精神滋养。另一方面，从全面从严治党的角度来看，党内政治文化是严明政治纪律的价值导引。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在坚持全面从严治党部分，明确强调要“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③。党内政治文化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效力，是广大党员坚持政治定力，树立政治自觉的精神力量。管党治党的实践表明，党内政治文化能够把管党治党的纪律性、原则性内容转化为党员的自觉意识和自觉行动，有助于形成全面从严治党的长效机制。

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其政党文化包括党内组织文化、党内纪律文化、党内廉洁文化等诸多方面。因此，党内政治文化与政党文化的概念所指并非等同，对党内政治文化的界定不能过于宽泛，否则就无法与政党文化中的党内文化进行区分，从而掩盖其本身所涵盖的特殊寓意。与政党文化相比，党内政治文化除了限定范围在个体政党内部，更加强调关系自身本质属性和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范畴。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特优势。所处环境的复杂性和承担使命的艰巨性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始终从“讲政治”的高度理解政治现实，推动政治实践。习近平多次强调“讲政治”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政治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根本性的大问题。”^④党内政治文化概念的提出，表明党对为何讲政治、如何讲政治等一系列关键问题认识的深化。党内政治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核心内容，指党内关于党的政治属性、政治信仰、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等关键性政治议题的认知积淀和观念倾向。

二、政治文化、政党文化与党内政治文化的主要差异

在行为主体方面，政治文化涉及不同领域的政治人及政治组织；政党文化和党内政治文化主要

①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210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49页。

③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1页。

④ 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9页。

涉及政党组织及其主要成员。除此之外，三者生成逻辑、核心要素、评价尺度和传递路径等方面还存在着更为显著的差异。

1. 生成逻辑的差异

政治文化的生成侧重于展现政治主体关于政治关系的处理和协调。政治文化与政治关系的产生、变迁甚至是冲突密切相关，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孕育出形态各异的政治文化。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政权，塑造了新文化，在各种政治关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因此，与西方国家政治文化不同，新中国政治文化凸显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互动形态。

政党文化的生成侧重于展现政党组织关于政治权力的认知和行使。从党内文化看，获取、运用和维护权力是现代国家政党组织参与政治实践的关键目的，这规定了政党组织及其成员的目标导向、评价标准、利益取舍等思想和行为模式。在此过程中，政党内部多数成员逐渐形成了基于政治权力的观念倾向和价值判断。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并把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因而其党内文化具有显著的人民性特征。权力将一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内的所有政党都汇聚在特定的活动体系内，权力的产生和分配机制使该体系内的政党逐渐对以何种方式参与政治合作、政治竞争形成了明确的观点和选择，从而赋予该体系相应的整体意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都主张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实现人民的利益。因此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是亲密合作的友党，而不是相互竞争的权力博弈关系。

党内政治文化的生成侧重于展现马克思主义政党关于自身政治特质的明确和强化。政治特质是对政党组织根本属性、真实定位的界定和还原。政治特质不同的政党组织，其利益表达与政治参与的目的、方式和理念也大相径庭。政治特质的内在规定性要求政党成员必须形成与政党自身政治特质相适应的心理取向，实现政党内部精神层面的塑造。党内政治文化源于中国共产党关于自身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特质的集体意识。虽然党内政治文化是新提出的概念，但其形成可以追溯到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自建党之日起就把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奋斗确立为自己的理想，并在科学理论与伟大实践的紧密结合中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属性、政治信仰、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等关键性政治议题形成了明确认识并不断强化。这些理想和认识的积淀为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的丰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2. 核心要素的差异

政治文化的核心要素是政治价值。按照行为方式的先后顺序，政治文化可以大致划分为判断性认知（例如政治观念、政治意识、政治评估等）与选择性态度（例如政治情感、政治信仰、政治理想等）两部分。政治价值蕴含了政治客体对政治主体所具有的实际效用，体现了主观需求与客观条件的内在融合。判断性认知是政治价值形成的前提和基础；选择性态度是政治价值输出的结果和体现。当新的政治价值成型并稳定之后，能够转而重塑政治主体的判断性认知和选择性态度。政治价值是衔接判断性认知和选择性态度的核心变量，充分体现了特定范围内政治主体的利益表达方式和政治关系的相互作用机制。因此，政治文化的区别在本质上是由政治价值的差异所导致的。习近平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凝聚中国力量的思想道德基础。”^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内容，突出体现了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

政党文化的核心要素是政党宗旨。目前学界关于政党文化的核心要素主要有四种观点，即政党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51页。

意识形态论、政党意识论、政权意识论和政党价值观论。与政治文化的构成类似，无论是理论性的政党意识形态，还是观念性的政党政治意识，其核心要素应当是政治价值性的存在。与政治文化相比，政党文化具有更加明确的主体组织和限定场域，用政党价值观作为政党文化的核心要素难以体现政党文化的组织特征，因此应当将政党价值观更加具体化、组织化。政党宗旨是政党公共价值导向和自身价值追求的有机统一。从党内文化的角度来看，政党宗旨是政党价值的具体化表述方式，凝结了政党性质、政党目标、政党利益等内容。从党际文化的角度来看，政党之间的互动在本质上是各政党之间宗旨的交锋或融合。例如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各民主党派天下为公、报国报民的宗旨相契合，从而推动形成了兼容并包的中国政党文化。

党内政治文化的核心要素是党性。党性是无产阶级政党固有其本性在其组织及成员中的具体体现。列宁认为：“党性是高度发展的阶级对立的结果和政治表现。”^① 党性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核心政治价值。对于党组织来说，党性体现为事关政党生存和发展的重大政治原则；对于党员来说，党性体现为党员所坚持的根本政治立场。1941年7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对违反党性倾向的各种具体表现进行了总结，明确指出了党性在塑造党员意识和倾向中的关键影响，并提出增强党性的系统部署^②。党性作为党内政治文化的核心要素，规定了党的政治本色、政治观点、政治思想、政治规矩和政治信仰等方面的具体内容，因此习近平强调：“我们的党内政治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革命文化为源头、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文化。”^③

3. 评价尺度的差异

政治文化的评价尺度是政治形态。政治形态是政治结构与政治功能的有机统一，是对政治系统运行模式的总体描述。不同面貌的政治形态体现出不同类型的政治文化。从政治结构的角度来看，政治文化制约了政治系统的内部运作。政治结构可以分为横向型的政治实践参与和纵向型的政治权力传导。贯穿其中的情感、态度等取向是政治结构得以运作的关键，并规定了政治实践参与的模式和政治权力传导的机制。从政治功能的角度来看，政治文化影响了政治系统的效用发挥。政治成员在其所属的政治系统中履行相应职能，使政治功能的设定成为事实。政治文化塑造了政治组织成员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进而影响政治功能效用的发挥状况。以民主政治为例，中国的协商民主制度体现了和而不同的政治文化，聚焦凝聚共识，主张求同存异，便于及时化解政治和利益分歧。而西方的党争民主则体现了自由主义的政治文化，容易导致“为反而反”“议而不决”“社会撕裂”等弊端。

政党文化的评价尺度是政党形象和政党格局。党内文化的评价尺度是政党形象。政党形象是社会成员对政党的总体认知和综合评价，是党内文化的外在呈现。政党形象所代表的独特标识是党内文化作用于政党组织及其成员所形成的客观结果。“一个政党的执政地位是否牢固，是否为社会所认同，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政党文化的外向性表现状况。”^④ 因此，政党形象可以判断和检验党内文化的先进与否。党际文化的评价尺度是政党格局。政党格局是指处于同一个政治系统内的政党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总体状态。政党之间联系机制和交往形式的不同，体现了党际文化的差异性。西方多党轮替、政党对抗的政党格局体现了竞争型的政党文化；而中国多元一体、求同存异的政党格局

① 《列宁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73页。

②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43—446页。

③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31页。

④ 柴宝勇：《政党政治的概念、框架与实践：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00页。

则体现了合作型的政党文化。

党内政治文化的评价尺度是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政治生态。习近平明确指出：“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政治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灵魂，对政治生态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① 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政治生态是党内政治文化对政党产生作用和影响的实际表达，体现了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和功能。一方面，党内政治生活体现了党内政治文化的观念导向和行为模式。党内政治生活是党员参与党内政治活动的行为综合，其中所涉及的基本规范、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是党内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党内政治生态体现了党内政治文化的精神指引和价值支撑。党内政治生态体现了党员参与党内政治活动的总体状况，无论是党员自身具有的心理取向，还是党员所处环境的整体面貌，都是党内政治文化直接塑造的结果。因此，从党内政治生活的规范与否、党内政治生态的净化与否的视阈，可以看出党内政治文化的健康与否。

4. 传递路径的差异

政治文化的传递路径主要是政治社会化。政治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并非完全自发形成的，而是通常受到政治体系内主要成员的自觉建构。政治文化更能影响政治认同和政治稳定，因此，如何将特定的政治文化传承和延续下去，是每个政治体系都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广义上的政治社会化指社会对其政治文化进行代际传递的方式^②。政治体系及其社会成员通过政治社会化形成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政治社会化使社会成员能够系统获得相应的政治观点、政治态度和政治情感等内容，使社会成员转变为政治成员。在现代政治体系中，家庭、朋辈、学校、社群、传媒和政治组织等诸多渠道构成了政治文化的传递媒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政治文化的传递必须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施重点，以思想政治教育、政治理论宣传和有序政治参与等为主要途径，不断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自觉认同。

政党文化的传递路径主要是政党建设与党际交往。党内文化的主要传递路径是政党自身建设。政党文化伴随政党创立、发展而逐渐形成，对党员的心理活动和实践活动具有重要影响。对政党组织来说，通过政党建设，包括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规章、仪式和纪律等方式，有利于整合党内思想共识，明确自身价值取向，同时也能够使被广大党员所认同的价值观念和取向模式被新的党员所接受。党际文化的主要传递路径是党际交往。通过党际交往，能够使政党之间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观念形态通过各种互动形式进行明确和整合，在此基础上实现党际文化的代际传递。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即通过团结互助、互相监督、政党协商等交往方式不断践行与发扬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中国政党文化。

党内政治文化的传递路径主要是党的政治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③ 传承和发扬党内政治文化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首先，通过明确党的政治目标能够推动党员树立政治意识。把党的意志融入党员思想和行动中，有利于确保广大党员成为党的政治路线的坚定拥护者和自觉践行者。其次，通过夯实党的政治信仰能够推动党员强化政治意识。用党的科学理论教育全体党员，有利于巩固全党的共同思想基础，使广大党员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 and 解决问题。最后，通过严明党的政治纪律能够推动党员坚持政治原则。用政治纪律约束党员的政治行为，有利于广大党员树立模范意识，同时能对少数党员存在的错误言行起到防范和纠正作用，确保党内政治文化朝着正确方向发展。

①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458页。

② Kenneth P. Langton,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4.

③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0页。

三、政治文化、政党文化与党内政治文化的内在共性

政治文化、政党文化、党内政治文化既非政治现实的简单化反映，也非脱离实践的理念性建构，而是从文化视角对不同政治范畴客观存在的理解和阐释。从文化特征的角度看，三者具有诸多内在共性。

1. 文化性质：积极性与消极性的区分

从文化培育和发展角度出发，必须首先要注意和警惕那些客观存在的消极内容，将这些消极内容与所倡导的政治文化、政党文化、党内政治文化严格区分开来。判定政治文化、政党文化、党内政治文化的性质，关键是看其内涵和本质是否符合绝大多数政治主体的利益，是否有利于政治主体的发展进步。习近平强调：“先进的思想文化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反之，落后的、错误的观念如果不破除，就会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桎梏。”^① 消极文化一般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迷惑性，对文化整体形态构成严重威胁。消极文化主要分为落后文化和有害文化两种类别。落后文化的内容和形式通常陈旧过时，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有害文化通常会对文化主体产生错误的导向，使文化主体形成错误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如果不能及时发现和限制消极文化，就不可避免地冲击和动摇文化的价值内核，造成文化主体思想和实践上的混乱。

在培育和发展政治文化、政党文化与党内政治文化过程中所遇到的消极性内容往往是社会不良文化在相应政治场域中的体现。在中国，这些消极内容的产生，既有传统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因素。一方面，中国具有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历史，旧社会盛行的官僚主义、封建迷信、绝对人治、家长制、一言堂等消极文化现象并没有被完全清除。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推动了人们思想的解放。但与此同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极端个人主义等消极思想文化也逐渐滋长。以党内政治文化为例，习近平强调：“旗帜鲜明抵制和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不断培厚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② 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指出：“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坚决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坚决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坚决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③

2. 文化效能：规范性与激励性的并存

规范性效能是指文化能够塑造人们的思想认知与取向模式，通过精神规范推动行为规范。首先，政治文化为政治体系内的不同主体提供了一套关于思想和行为的认知、判断和评价标准。这个标准作为该政治体系内多数成员的集体意志，有利于规范政治体系内的政治成员，维持政治秩序的稳定。其次，党内文化是政党教育党员的重要内容，能够使党员潜移默化地接受政党的价值观，进而保证党员的思想言行符合政党的标准。当然，在不同的党内文化背景下，党员所受到的规范性约束也有差异。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把严格管理和约束党员作为维护自身先进性与纯洁性的重要途径。党际文化使政治体系内的各个政党能够遵循特定的交往模式，维持政党制度和政治体系的稳定性。最后，党内政治文化的规范性效能使广大党员站稳政治立场，贯彻政治领导，把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转化为自觉行动。

①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9页。

②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458页。

③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0页。

文化的激励性效能主要来自价值引导下的自觉认同和坚定信仰。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说，文化的激励性效能有利于调动政治主体参与政治体系运行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推动政治思想、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的创新，使政治体系更加具有生机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为引领人民群众有序参与政治生活和激发社会主体积极开展政治实践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党内文化的角度来看，文化的激励性效能有利于推动党内价值整合，提升党员对政党组织的认同感，维护政党组织的团结统一。同时，积极的党内文化也能够增强广大党员参与政党建设和政党事业的使命感，为广大党员营造锐意进取、奋发有为的良好氛围。从党际文化的角度来看，文化的激励性效能有利于政治系统内的政党积极开展合作和交流，推动商议和解决重大事项。中国政党文化所具有的和合与共、兼容并包、求同存异、天下为公等特质，有利于推动执政党和参政党实现通力合作。从党内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看，文化的激励性效能有利于广大党员坚定政治信仰，夯实思想根基，在积极完成党的工作的同时，主动提升政治本领，自觉同危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

3. 文化层积：历史性与时代性的融合

习近平指出：“历史虽然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但总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出现在当今人们的生活之中。我国传统思想文化根源在社会生活本身，是人们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①文化是经过不同社会发展阶段逐渐层积的精神产物，历史上的文化内容往往构成特定文化形态中最基础、最深厚的部分。历史的演进，不仅为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资源，同时也是对文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检验过程。对于政治文化、政党文化和党内政治文化的历史性分析，既要从宏观社会历史背景出发，也要结合微观政治主体的演进历史。对于政治体系来说，政治文化的发展是不断累积的建构过程。复杂多样的基因和历史是政治文化的显著特征^②。对于政党组织来说，文化形态的历史性不仅体现在其受到所在国家或地区历史文化的影响，同时也体现于政党自身的发展历史和历史活动。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文化既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体现于党领导塑造的革命文化、建设文化和改革文化之中。

处于不同的历史方位中，人们在思想意识、价值标准和行为模式等方面会产生许多新形式和新内容。对于政治主体来说，所处时代的诸多特性都会反映到政治文化领域，从而塑造新的政治价值、政治认知和政治态度等。对于政党组织来说，其通常会根据历史方位和时代条件的具体要求，对自身所涉及的文化形态进行适应性的创新。文化的时代性是历史性的继承和延续，同时也是文化先进性的重要标志。只有立足时代发展、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化形态，才能为文化主体提供正确、有效的价值指引和精神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性的成就和社会变革，中国政治文化、中国政党文化、中共党内政治文化与党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丰富实践相适应，在全新的历史方位上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4. 文化变迁：稳定性与嬗变性的交锋

文化在社会发展中受到各种因素影响的同时，往往保持着相对独立性。这是由于某种文化形态产生后，其价值内核能够成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内在基因，从而使人们的心理、态度和行为产生某种定式，并以此形成人们认识和思考问题的标准。政治文化的稳定是保持政治体制稳定的重要精神支撑。虽然历经政权更迭和社会性质转变，中国历史上的民为邦本、天下为公、为政以德、礼法共

① 《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 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4日。

② Michael Brint, *A Genealogy of Political Cultur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1, p. 2.

治等政治价值依然延续至今。党内文化的稳定来源于政党在政治体系中始终保持自身特色，持续凝聚党员共识的内在要求。党际文化的稳定来源于特定政治体系内政党长期达成的普遍共识，并使这些政党处于可预见的互动关系中，从而满足政治体系内所有政党的共同利益。党内政治文化的稳定是保持无产阶级政党政治属性及其政治本色的内在要求。政治文化、政党文化、党内政治文化的稳定性有利于维护相应的政治秩序和政治价值，但也可能导致政治主体思想和行动的滞后，因此要辩证看待文化的稳定性。

文化作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其稳定性是相对的，而嬗变性是绝对的。时代的发展必然导致文化的内在构成和基本内涵发生转变。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看，历史方位的变化会导致政治文化发生嬗变。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政治生活需要自然也构成了新时代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导向。从党内文化的角度来看，政党自身的发展环境、政治地位、组织体系、人员构成、目标任务等条件的变化会导致党内文化发生变化。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也相应发生变化。从党际文化的角度来看，政治局势和时代主题等变化会影响党际文化的发展。从党内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看，政治环境、政治任务、政治目标和政治路线等党内外因素会影响党内政治文化的塑造。文化的嬗变性要求我们必须立足实际，推陈出新，主动对政治文化、政党文化和党内政治文化进行适应性的建设和改造。

综上所述，政治文化、政党文化和党内政治文化在本质上都是反映政治现实的文化类别，是特定场域内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精神产物。中国语境中的政治文化、政党文化、党内政治文化具有紧密联系：以党内政治文化为核心内容的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对中国政治文化、中国政党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中国政治文化、中国政党文化也在中共党内政治文化中有所反映。对政治文化、政党文化和党内政治文化的理解要充分考虑到特定范围内综合因素的影响，用系统和全局思维把握三者的具体内涵，避免不科学的相互套用，在此基础上深入挖掘和准确理解“中国道路”和“中国智慧”背后的文化因素，为树立文化自信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参考文献：

- [1] 王沪宁：《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结构》，《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
- [2] 王乐理：《政治文化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 [3] 李冉：《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
- [4] 辛鸣：《论党内政治文化》，《北京日报》2017年1月16日。
- [5] 梅荣政：《党的政治文化建设的路径和紧迫任务》，《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9期。

（编辑：张 桥）